

| 台湾研究系列 |

# 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与台湾问题

何子鹏 王鑫元 著



九州出版社  
JIUZHOU PRESS

|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台湾研究系列

# 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与台湾问题

何子鹏 王鑫元 著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与台湾问题 / 何子鹏, 王鑫元著  
--北京: 九州出版社, 2016. 10  
ISBN 978-7-5108-4791-2

I. ①中… II. ①何… ②王… III. ①中美关系-研究  
②台湾问题-研究 IV. ①D822.371.2; D61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42839 号

## 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与台湾问题

---

作 者	何子鹏 王鑫元 著
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 35 号 (100037)
发行电话	(010) 68992190/3/5/6
网 址	www.jiuzhoupress.com
电子信箱	jiuzhou@jiuzhoupress.com
印 刷	北京九州迅驰传媒文化有限公司
开 本	720 毫米 × 1020 毫米 16 开
印 张	22.25
字 数	402 千字
版 次	2016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08-4791-2
定 价	58.00 元

---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 序

西方传统国际关系理论认为，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之间由竞争到冲突到战争的大国政治悲剧不可避免。但在全球化时代，传统国际关系理论已不能解释大国崛起新模式。习近平同志提出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就是要为打破“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必然冲突”这一“历史铁律”提供理论支撑和实践指导，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台湾问题作为中美关系中最敏感、最棘手的问题，其在两国关系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尤其随着近年来中国的强劲发展和国际地位的显著提升，中国政府就中美关系与台湾问题确定了与时俱进的战略思维和方针政策，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条件已初步具备，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局面已逐渐形成。但与此同时，民进党再度执政及岛内“反中偏独”气氛增强使两岸关系面临的变数骤然增多。如何处理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中的台湾问题，已是摆在我们面前重大而紧迫的任务。本书正是以此为根本出发点，展开课题研究。

按照层层递进逻辑，本书将内容划分为“回顾、酝酿、创新、挑战、超越”五部分。“回顾”部分主要论述传统大国关系下中美围绕台湾问题的博弈。“酝酿”部分主要论述相互依存背景下中美关系与台湾问题的新发展，尤其是“9·11”事件后美国对台政策两次较大幅度的调整。“创新”部分主要论述2012年前后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概念提出的背景、经过、内涵、理论基础、现实基础及对台湾问题的影响。“挑战”部分主要论述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障碍性因素，包括两国决策环境的困扰、热点敏感问题的牵制及战略互信不足等问题。“超越”部分主要论述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可行性路径以及在此框架下解决台湾问题的可能性描绘。

本书提出，在传统大国关系下，冷战思维、零和博弈在中美关系中占据要津，虽然其间有过缓和，但竞争、冲突和对抗始终是主流，“台湾问题”始终是中美关系中一个难以逾越的“问题”；在相互依存背景下，零和博弈、冷战思维在中美关系中依然顽固地存在，但中美关系中具有新型大国关

系的因素也在顽强地生长，两国开始探索建立既非结盟又非敌对、平等、务实合作的伙伴关系。为加强与中国在诸多问题上的合作，美国对其台海政策进行了有益调整，但依然摆脱不了“以台制华”思维的束缚，依然带有两面性、矛盾性、模糊性的固有特征；在新型大国关系下，台湾问题作为美国防范、遏制中国战略筹码的作用大为降低，美国对台湾问题的插手、干涉逐步减少，但中美关系“复杂相互依存”的基本属性没有改变，老问题犹存、新问题凸显，充满跌宕与坎坷、争论与矛盾。美国唯有扭转“以台制华”的传统观念，展现诚意、务实和弹性，才能疏导中美关系。美国尊重中国核心利益，可换取中国尊重美国在其他议题上的重大关切。

本课题在相关国际关系理论指导下，紧跟国家战略前沿，把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这一新命题与中美间台湾问题这一老难题紧密结合，首次把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研究范围拓展并具体化到台湾问题上，引领我们以更加符合客观现实的视角来看待未来的中美关系与台湾问题，有利于更好地揭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科学内涵，有利于挖掘台湾问题的时代特点。本书立意新颖，结构合理，条理清晰，具有较高的创新性、科学性、系统性、理论性及学术价值。同时，本着大胆设想、小心求证的研究指向，本书对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过程中如何妥善解决台湾问题提出了一些思考，相信一定能对认识 and 解决这一命题提供有益参考。

两位作者长期从事一线对台工作，研究功底扎实，业务能力突出，勤于思考，善于总结，能及时了解国内外相关前沿动态，吸收相关学术最新成果。专著的出版只是作者跟踪和研究此命题的阶段性成果，我希望他们今后继续聚焦有关问题的最新动态，开展更深入的考察，寻找更科学的答案，提出更合理的建议，为促进祖国和平统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添砖加瓦。

是为序。

中国华艺广播公司董事长 邱雨

2016年10月1日

# 目 录

序 .....	(1)
第一章 绪论 .....	(1)
第一节 研究缘起 .....	(1)
第二节 研究现状 .....	(9)
第三节 研究方法及相关理论 .....	(16)
第二章 回顾：中美传统大国关系下的台湾问题 .....	(20)
第一节 紧张对峙时期中美在台湾问题上的博弈 .....	(20)
第二节 关系正常化时期中美在台湾问题上的博弈 .....	(37)
第三节 冷战结束后中美在台湾问题上的博弈 .....	(60)
第三章 酝酿：中美日益相互依存背景下的台湾问题 .....	(75)
第一节 9·11 事件后美国对台政策调整 .....	(75)
第二节 两岸关系缓和后美国对台政策调整 .....	(94)
第三节 美国对台政策调整的局限 .....	(111)
第四章 创新：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下的台湾问题 .....	(125)
第一节 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命题的提出 .....	(125)
第二节 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理论基础与现实条件 .....	(151)
第三节 中美发展新型大国关系对台湾问题的影响 .....	(168)
第五章 挑战：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障碍性因素 .....	(188)
第一节 中美双方决策环境的困扰 .....	(188)
第二节 热点敏感问题的牵制 .....	(214)
第三节 战略互信不足 .....	(252)
第六章 超越：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在台湾问题上的突破 .....	(263)
第一节 推进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基本路径 .....	(263)
第二节 美国内“弃台论”的现状与前景 .....	(274)
第三节 解决中美间台湾问题的可能性描绘 .....	(300)
参考文献 .....	(326)

# 第一章 绪 论

## 第一节 研究缘起

实现中国梦需要安定和谐的内部环境，亦需要合作共赢的外部环境。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对营造和平国际环境至关重要。习近平主席指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是一项前无古人、后启来者的创举，做起来并不容易，但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就一定能走出一条新型大国关系之路。中美关系的特殊性、复杂性决定了破解中美结构性难题需要一定的想象力。本着大胆设想、小心求证的研究指向，我们对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过程中如何妥善解决台湾问题提出了一些思考。

### 一、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历史契机已经到来

西方传统国际关系理论认为，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之间由竞争到冲突到战争的大国政治悲剧不可避免。但全球化时代，传统理论已不能解释大国崛起新模式。作为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中美利益冲突在所难免，但二者更有广泛的共同诉求，只要两国学会拓展共识，管控分歧，就能以良性竞争取代“零和博弈”。当前，冷战思维在中美关系中依然顽固存在，但中美关系已经出现了一些不同于传统大国关系的新契机，这些契机本身就是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具有萌芽性质的表现。

一是国际关系日益相互依存。随着全球化趋势的发展，国际关系日益相互依存，国与国之间经济交流与合作已经联为一体，“谁也离不开谁”，对国际政治博弈模式和各国政策酝酿产生重大影响。国际政治竞争中敌我观念悄然改变，“零和思维”固然犹存，别国虽然依旧可能对自己产生威胁，但事实上别国的稳定与发展却往往是自身发展的必要条件。在此情形下，奉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不仅不是维护国家利益的优先选项，几乎就是不可能的选择。全球主要大国着手探寻构建适应国际政治新情况的大国关系，纷纷建

立既非缔盟又非敌对、协作互利共赢的“伙伴关系”。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民族振兴，中美双方角逐更加明显，但两国合作的领域也日益扩大了，合作的水平也日渐提升了；中美双方的竞争与摩擦虽然有所增多，但两国之间的利益共同点也在加速发展。中美双方从未像今天这样拥有如此广阔的共同利益。相互依存与深化合作是双边关系的主流趋势。中美两国政界和学界先后用“同舟共济”“风雨同舟”“同床异梦”“命运共同体”“中美国”“G2”等概念形容两国关系，虽然出发点有所不同，但都承认中美间这种既相互竞争又相互依存的复杂关系。两国政府有关两国关系的任何决策，也都必须尊重这一前提。

二是国际社会面临的非传统安全威胁增大。近年来，国际恐怖主义、金融危机、环境污染、气候变迁、能源安全、自然灾害、传染性疾病、难民危机等全球性问题突显，成为阻挡人类社会向前发展的障碍。此类难题突发性强，跨国性广，随机性大，可控性低，难以准确预报预防。更为严重的是，这些日益增多的全球性问题往往与军备竞赛、军事威慑和军事冲突等传统安全威胁相互渗透、相互转化，对国际安全和国际秩序构成多重威胁。解决此类全球性威胁，仅靠传统的某个大国或其盟国体系是远远不够的。各国必须搁置分歧，增进共识，建立行之有效的国际合作新机制。尤其中美两个大国，在应对非传统安全问题上有着广泛合作空间。中国谋求在国际上树立负责任大国的形象，美国则亟须中国作为利益攸关方分担全球义务，两种诉求的有机结合将为两国关系向前发展提供新的活力。

三是国际社会多极化、多元化趋势加快。在国际金融风暴的助推下，国际权力由西方国家向非西方国家尤其是新兴国家转移，国际格局由美国支配的“一极”形态向“多极”转移的态势方兴未艾。美国在世界舞台上力图维持的“单极时刻”面临越来越多的挑战，新兴大国逐渐成为制约美国霸权主义扩张的重要力量。虽然目前还没有哪个国家拥有终结美国“单极时刻”的物质、文化实力和政治意愿，但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由“单极”向“多极”的演变已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由于无法改变世界“多极化”发展趋势，美国不得不逐步接受大国和平崛起的现实。多元化也是目前国际体系中的一个显著特点。国家行为体以往是国际关系中几乎唯一重要的组成要素，但随着全球化脚步的加快，国际组织、跨国公司和其他非国家行为体大量介入国际社会，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增强，挑战着国家行为体的国际地位，加速了国际体系的分化与重组。更重要的是，网络虚拟空间的快速扩



张，模糊了国与国之间的边界、拓展了国际关系的运行空间，导致了国家利益与国家认同趋向多元，国家行为体也产生了利用非国家行为体来提升自身能力的思维与动机。在斯诺登事件中，原本被认为只追求商业利益、与政治关联度低的非国家行为体——Google、Facebook、Apple 和 Microsoft 等互联网跨国公司，已经强大到超级大国都设法借力的程度。

四是国际社会机制化、民主化趋势明显。当今世界虽然缺乏一个共同的有强制力的政府，但已不再是混乱与无序的无政府状态，国际组织、国际规则和国际共识等国际机制在规范国家行为、调解国际冲突、促进国际合作等方面作用突出。虽然世界部分地区、部分领域在国际机制建设方面尚有待完善，但国际机制已基本覆盖了所有地域和领域，并随着国际格局的演变而演变。虽然国际社会没有一个保障国际机制强制执行的中央权力机构，但事实上绝大多数国际争端与国际合作都是遵照这些机制解决和运行的。更重要的是，制定规则已成为各国政府处理彼此分歧时的优先选项，甚至是唯一选项。比如在网络安全治理上，虽然各方都在积极提升本国的网络攻防实力，但不管是中俄运用现有国际机制进行治理的“联合国模式”，还是美国等试图把战争法则引入网络空间而提出的《塔林手册》，他们首先寻求的是建立并主导机制，而非与对方正面对垒。具体到中美关系上，两国已从 20 世纪 70 年代的“乒乓外交”“秘密外交”发展成现在的全方位、各层级、各领域的关系网络，仅双边对话机制就有近百个。特别是“战略与经济对话”机制，已成为中美高层就事关两国关系发展的战略性、长期性、全局性问题进行磋商沟通的重要平台，并派生出战略安全对话、亚太事务磋商、中东事务磋商等机制，在实践中发挥了中美关系缓冲器和稳定器的作用。随着国际社会机制化程度不断加深，由欧美国家主导国际格局、发号施令的局面也得以显著改观，国际社会进一步加快民主化步伐。美国亦不得不收敛其霸权倾向，与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大国开展合作去解决日益增多的跨国问题。

## 二、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亟须从理论走向实践

首先，中美已就发展新型大国关系达成基本共识。2012 年 2 月，习近平主席访美时首次提出建立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倡议，逐步得到奥巴马政府的积极回应。同年 11 月，中共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推动建立长期稳定健康发展的新型大国关系”。2013 年 6 月，习近平与奥巴马在美国加州会晤，就发展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达成重要共识。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基本内涵

是“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根本要求是避免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必然冲突的历史定律重演，最终目的是实现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之间权力和平转移乃至和平换位。

其次，新型大国关系概念提升了中国国际话语权。冷战结束后，大国竞争手段由硬实力对抗为主，逐渐转变为在综合国力基础上的巧实力竞争为主。国际话语权作为塑造国家形象、争取外交主动的战略制高点，是国家巧实力运用的重要体现。长期以来，西方国家占据主流和强势的国际话语地位，而中国国际话语权并未随综合国力的提升而得到相应程度的提升。相反，无论中国如何强调和平崛起，“中美必有一战”“中国威胁论”“中国责任论”等论调依然大行其道。新型大国关系概念的提出及推广，得到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大国认可，客观上优化了中国国际形象，提升了国际话语权。

1. 积极化解“中美必有一战论”。西方传统国际关系理论认为，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之间由竞争到冲突到战争的大国政治悲剧不可避免。这一“历史铁律”导致美国民众对中国敌意明显增加。据美国盖洛普 2014 年民调，中国已取代伊朗，成为美国民众眼中“头号敌人”。但全球化时代，传统理论已不能解释大国崛起新模式。以“不冲突、不对抗”为理念的新型大国关系对国际关系理论创新具积极意义。作为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中美利益冲突在所难免，但二者也有广泛的共同诉求，只要两国学会拓展共识，管控分歧，用良性竞争取代“零和博弈”，就能开辟大国关系新模式。当然，这种创新性理念在美国社会落地生根，还需度过一段心理适应期，毕竟中美关系的话语权长期掌握在美国手中，中国很少成功推出过类似“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话语系统。

2. 主动防范“中国威胁论”。近年来，随着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日益提升，中国在国际舞台上更加活跃，在维护东海、南海等国家主权问题上更加主动，客观上增加了同他国产生摩擦的机会，各种版本的“中国威胁论”纷纷出台，严重损害中国形象。据英国广播公司（BBC）民调，2013 年国际社会对华负面印象达 39%，创 8 年来新高。新型大国关系强调“相互尊重”，儒家文明向来“以和为贵”，中国人的血脉中没有称王称霸的历史基因，也不会延续“国强必霸”的传统大国崛起模式。中国经济增长给世界带来商机，中国潜在市场已成为全球市场的稳定器，世界经济的发动机。

3. 妥善应对“中国责任论”。近年来，西方国家积极散布“中国责任论”，要求中国对环境、气候、减排、新能源、核扩散等领域分担更多与国

力相适应的责任。试图将中国作为一个维护者而非挑战者纳入西方主导的全球体系，维护西方霸权。新型大国关系强调“合作共赢”，中国愿做负责任大国，但责任与权力应相统一，在中国承担更多国际责任的同时，西方也应该与中国分享国际权力，在国际组织与国际事务中让渡部分代表权与话语权给中国。

最后，新型大国关系不是口号式目标，而是具有现实可行性的战略选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出，不仅提升了中国国际话语权，改善了中国外部环境，之后更完成了从口号到实践的提，逐渐成为解决国与国关系的基本准则。新型大国关系作为新兴理论，正处于日趋完善的进程之中，但其“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等普世话语，不应只是理念，而应通过实践加以推进，落实到中美关系的方方面面。当前，中美正在就这一战略命题展开深入探讨，得出了很多有益结论。但新型大国关系更多是实践问题，而非理论问题。两国不但要创新思维，更要付诸实践，在中美关系发展中提出具体做法。虽然中美在社会制度、文化传统、意识形态、经济体制等方面差异很大，和平共处的障碍很多，但冷战时也曾因共同对手苏联而走向合作。在国际格局深刻变革的今天，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必定不会一帆风顺，但只要有“不到长城非好汉”的毅力与意志，“摸着石头过河”的沉着与耐性，就一定能走出一条新型大国关系之路。

### 三、亚太地区应成为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试验场

当前，中美正在就如何构建新型大国关系问题展开深入探讨，双方逐渐认识到，亚太地区应成为这一战略命题的试验场。

首先，亚太是中美两国利益交织最密集地区，存在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紧迫性。近年来，国际权力重心加速东移。亚太地区作为中国安身立命之所和美国战略攸关之地，是中美利益交织最密集地区。若两国在亚太能和平相处，在其他地区也能摆脱对抗。中美在亚太地区分歧众多，处处牵动两国关系神经，但其中比较突出的结构性难题是安全问题。一是冷战遗留问题，如朝鲜问题、台湾问题；二是历史遗留的领土争端，如东海问题、南海问题。国际权力重心东移和中国崛起是美国重新布局亚太的重要考虑。美国反复保证其“重返亚太”不是遏制中国，中国也再三保证不试图阻挠美国进入亚太或挑战其全球地位。但没有任何一方完全相信对方的保证，也不相信随着

两国相对实力的变化，双方会继续坚持上述保证。中美在亚太地区争议最大、互信最低，急需构建新的安全框架。

其次，中美并驾亚太的“二元结构”基本形成，存在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可行性。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不能凭空产生，必须在两国关系现有基础上逐步推进和完善。近年来，亚太地区呈现一个新的领导模式，即“双领导体制”。经济上，中国逐步提升地位并开始发挥引领作用，其对亚洲经济增长贡献率已超50%，美国则由于2008年金融危机而陷入困境；安全上，美国仍保持霸主地位，中国短期内难以打破美国主导的东亚安全体系。虽然亚太地区已成为世界经济发展引擎，并加快了区域经济整合步伐，但安全方面走势却越发恶化，以致形成了美国主导的安全结构和中国主导的经济结构并存的“二元结构”。亚太国家经济发展靠中国、安全保障靠美国的“二元依赖”也愈加明显。中美已成为亚太经济和安全格局的塑造者、主导者和建设者。一方面，亚太地区的复杂性、多样性决定了中美都无法单独成为区域主导国家。中国无论如何发展都不可能将美国挤出亚太，美国无论怎样部署都无法阻挡中国崛起，两国“谁也吃不掉谁，谁也离不开谁”，大国平衡是保持亚太和平与发展的唯一路径。另一方面，国际体系中相互依存与全球化趋势齐头并进，相互交织，中美两国合作领域逐渐扩大。两国经济和安全利益深度交叉，高度重叠，“二元结构”也不必然导致二者水火不容。中美在亚太权力均衡的出现和相互依存的加深，是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重要基础。

再次，中美之间权力转移现象方兴未艾，美国亟须确立新的大国交往机制。近几年，中美之间权力对比此消彼长，中国的权力日渐增强，美国的权力相对弱化。美产生“霸权焦虑”，由此推出“重返亚太”战略：在安全上增加亚太军事存在，强化由多个双边军事同盟构成的“轴心—轮辐”体系，拉拢中国周边国家，形成对华“C形包围圈”；在经济上大力推进“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议”（TPP）扩容谈判，试图架空中国主导的东亚区域经济整合。短期看，美“重返亚太”是战略进攻，但长远看却是战略防守。毕竟中美实力正快速拉近，美不得不进行战略调整。美从全球其他地区战略收缩，把资源集中于亚太对中国围堵。虽然美不惜以牺牲全球其他利益为代价，但其“重返亚太”明显底气不足：一是经济上力不从心，难以对亚太进行大幅投入，TPP谈判亦困难重重，短期内难有成效；二是只进行军事调整效果不彰，无法把崛起的中国拒之于地区安全框架门外；三是任外交上受制于叙利亚、伊拉克、阿富汗、乌克兰和朝核等问题的牵制。美虽然动

作频频，姿态高昂，但并不能保证“重返亚太”一定得胜。随着中美之间权力转移现象持续发展，美国与中国讨价还价的筹码越来越少，时间越拖对美国越不利。由于无法改变权力转移大趋势，美国也不得不逐步接受现实，对大国和平崛起的容忍度开始增加，并开始探索大国关系新模式。

最后，“北约东扩”与“重返亚太”渐趋融合，中国亟须确立新的大国交往机制。冷战结束后，美国先后推出了旨在融合俄罗斯的“北约东扩”战略和带有鲜明遏制中国色彩的“重返亚太”战略。经过近20年东扩，北约成员新增近半，昔日战略缓冲区乌克兰现已成为北约东扩最前沿。而且，北约发展伙伴关系的外展势头逐步加强，目前已与日本、韩国、蒙古、阿富汗、巴基斯坦、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建立了伙伴关系，成为美国推动欧洲国家与其一道将战略中心共同聚焦亚太的主要工具。然而，“北约东扩”是在美国国势如日中天而俄罗斯实力急剧下降的背景下推出的，“重返亚太”战略则是在美国深陷经济危机与战争泥潭而中国实力急剧上升之时出现的。“北约东扩”在某种意义上取得了一定成功，俄罗斯意欲融入欧洲安全框架就是最好说明。但美国无法保证“重返亚太”战略一定得胜。今后一段时期，如果中国持续崛起，而美国未能摆脱经济困境，则美在亚太地区维持霸权优势的可能性与可行性将大幅下降。届时，不甘屈居第二的美国推动新一轮“北约东扩”的可能性将大幅提升。当前，随着美国“重返亚太”越来越力不从心，“北约东扩”与“重返亚太”已呈现渐趋融合趋势。原来美国认为“俄罗斯加入北约”不可思议，现在则有人认为应当认真考虑“俄罗斯加入北约”的问题。俄罗斯作为影响中国战略机遇期的核心外部要素之一，与中国长期保持战略合作，但俄作为世界重要一极，是欧亚大陆重要的地缘战略棋手，有着自成体系的全球战略与抱负。随着中俄实力差距拉大，俄战略地位抬升，俄对华政策不可避免带有更多大国制衡色彩。尽管短期内俄罗斯融入北约的前景相当渺茫，但长远看，一旦美国“重返亚太”战略受挫，北约吸纳俄罗斯的可能性将不能排除，中国也将因此面临更大的战略困境。如果中美成功走出一条新型大国关系之路，不仅能缓和东亚氛围，更能软化美国对华立场，缓解“北约东扩”与“重返亚太”对中国造成的双重压力。

#### 四、台湾问题应成为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试金石

美国与台湾的特殊关系，自1949年始一直延续至今，成为影响中美关

系以及海峡两岸统一的掣肘性因素。为分化中苏关系，美国先是对新中国观望，摆出一副抛弃蒋介石集团的姿态。中苏结盟和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转而鼓吹“台湾地位未定论”，把台湾作为对华战略的王牌。随着美苏争霸进入第二阶段，美国实力相对下降而苏联实力上升，美国为实现“联中抗苏”的战略构想而不得不与台湾“断交”。冷战结束后，美国为围堵中国，又把台湾作为牵制中国的桥头堡。进入新世纪以来，全球化的发展和中国的快速崛起导致中美相互依存日渐加深，共同利益不断拓展。为加强与中国在诸多问题上的合作，美国对其台海政策进行了有益调整，但受近代以来大国对抗的惯性影响，“零和博弈”、冷战思维在中美关系中依然顽固地存在，美国对台政策调整依然带有很大的局限性，始终摆脱不了“以台制华”框架的束缚。毋庸置疑，“台湾问题”之所以长期以来一直是中美关系中的一个“问题”，完全是美国霸权主义扩张的结果；对于中国来说，则是百余年来受侵略、被瓜分历史的尾声。很难想象，曾经为结束民族分裂而付出了重大牺牲的中国人民，能长期容忍这种状况。尤其是近年来随着中国的强劲发展和国际地位的明显提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正在发挥巨大感召力。中国共产党审时度势，就中美关系与台湾问题确定了与时俱进的战略思维和方针政策，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条件已初步具备，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局面已逐渐形成。如何处理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中的台湾问题，已是摆在我们面前重大而紧迫的任务。本书正是以此为根本出发点，展开课题研究。

如前所述，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首先要协调好两国在亚太的利益关系。而在错综复杂的亚太关系中，则要抓住主要矛盾和合理安排议程。我们认为，台湾问题应成为这一战略命题的试金石。一是中美在台湾问题上大国对抗色彩淡化，合作空间增加。中美在亚太地区分歧众多，处处牵动两国关系神经，但其中比较突出的结构性难题是安全问题：（一）冷战遗留问题，如朝鲜问题、台湾问题；（二）历史遗留的领土争端，如东海问题、南海问题。美国“重返亚太”以来，中美关系中竞争性因素明显增强，主要表现在南海、东海问题。相比之下，在台湾问题上，中美不存在竞争性、对抗性明显加强的情况。岛内第二次政党轮替后，台湾问题在中美关系中的重要性未变，但紧迫性降低，可控度增加，冲击力减小。虽然美国终极目标是维持台海现状，中国终极目标是实现两岸统一，但保持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态势是中美共同利益诉求。虽然2016年民进党上台影响台海局势稳定，但中美两国都不是主动挑起事端的一方，其行为更多是被动反应。双方虽然在如何对

付“台独”问题上存有分歧，但历史上已形成有效管控“台独”的经验。在此问题上，中美始终保持沟通，扩大合作。

二是中美在台湾问题上战略困境渐显，调整需求加大。一方面，美国对台战略亟须调整。两岸实力对比失衡加剧及关系总体向好趋势大大压缩了美国对台政策的选择空间，美通过两岸对抗谋取私利的可行性大大降低。随着中国迅速崛起，美国已无法长期担负维持台海力量“均衡者”角色，“以台制华”能力大大减弱。另一方面，中国大陆对台战略亟须调整。当前，民进党顽固坚持“台独”主张，“九合一”选举和2016大选更强化了其不承认“九二共识”也能执政的信心，短期内不会对两岸政策进行实质调整。国民党“本土化”趋势进一步明显，两岸政策主张趋向谨慎，短期内难以东山再起，更谈不上继续推动两岸关系向前发展。美国仍不愿放弃在两岸事务上的主导权，不希望两岸关系发展超出其预期和掌控，对国、民两党两面下注，客观上增加了台当局“依美拒统”的筹码，也让台当局在处理两岸关系时不得不顾忌美方感受。

## 第二节 研究现状

由于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美国是全球最大的发达国家，中美关系自然也就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正因如此，“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概念一经出炉，即受到国际关系学界广泛关注。学者们对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提出的背景、内涵、理论基础、现实基础、障碍性因素、实现路径等进行了大量有益的研究，为推动两国关系向前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撑。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敏感、最棘手的问题，其在中美关系研究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大陆、台湾和美国都有专门的学者队伍对这一问题进行跟踪和分析，研究领域涉及台湾问题在中美关系中的地位 and 影响、台湾问题对美国的战略价值和地缘政治意义、美台关系尤其是美台军事关系、美国对台政策及影响因素、中国崛起与台湾问题、中国政府对美国对台政策的反应与对策、中国解决台湾问题的政策与路径、美国国内的“弃台论”思潮、美国“重返亚太”布局中的台湾等方面。

然而，研究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学者与研究台湾问题的学者尚未将二者进行有效融合，即大多学者将考察对象放在新型大国关系的内涵、必要性、可行性、未来前景等总体思路与总体框架上，鲜有人将研究领域具体化到台

湾问题上；大多学者在研究台湾问题时关注的是其对中美关系传统意义上的影响，少有学者把它放在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框架下进行专门考察。

## 一、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研究现状

2015年5月中旬，我们在“中国学术文献网络出版总库”中对“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进行检索，发现有172篇学术论文、5部论著与这一主题相关。中国学者对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内涵有比较统一的认识，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牛新春教授在《关于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几点思考》一文中指出，把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定位为“拥有战略互信的竞争关系”比较切合实际，首先，鉴于政治制度、历史文化、经济体系、宗教传统迥然不同，两个体量相当、性格各异的庞然大物相遇，摩擦、竞争自然免不了，应当承认中美是一对战略竞争关系。其次，要认识到中美之间可以建立战略互信。当双方都认为他方以“绝对收益”“非零和模式”为首要追求时，就应该视为具有战略互信。

关于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可能性，中国学者从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有利条件与面临障碍的视角出发，得出的结论总体上表现为审慎乐观。一方面认为存在着可能，如国际问题研究所徐坚研究员在其《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历史条件与主要问题》中提出，中美能否摆脱守成大国与新兴大国必然对抗的历史宿命，首先要看当今时代背景能否为双方提供必要的条件，避免类似英德之间或美苏之间的冲突；幸运的是，从中美两国在经济、政治、安全等各领域的相互关系看，双方都有条件避免大的冲突，没有发生战争和对抗的必然性。另一方面又普遍认为难度极大，并非易事，华东师范大学张建博士在其《试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一文中指出，在当今世界上最重要的两个国家之间构建这样一种新型大国关系，是非常艰难的，将面临很多不确定性，比如美国对于中方倡导构建新型大国关系还处在酝酿阶段，对其历史背景、战略意涵、发展方向等还没有深入的认识，在官方和学界还没有形成共识等。

关于中美如何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中国学者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金灿荣教授在《为中美发展新型大国关系注入正能量》一文中提出“两个分担”（two reciprocal shares）的概念，即“美国分享权力、中国分担责任”。具体地讲，两国应展开建设性、功能性的合作，一方面，中国可以帮助美国分担更多的国际责任，如气候变化、伊核、



朝核、应对非传统安全、稳定和平衡全球经济等挑战，主动承担更多的与国力和地位相适应的国际责任，做一个负责任的大国，摆脱过去那种“大国家、小国民”的心态；另一方面，美国也要相应地与中国分享它的国际权力，让渡部分权力和中国所需的国际空间，帮助中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二十国集团、世界贸易组织等国际组织中以及全球和地区事务上寻求更大的话语权与代表权，尊重中国在世界其他地区的利益关切。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杨洁勉院长在《新型大国关系：理论、战略和政策建构》中提出，实现新型大国关系既需要理论和战略，也需要脚踏实地，在政策制定和实施上加强相互间的磨合，首先要确定大国关系的议题和议程，在复杂纷繁的大国关系中，找对主要议题和准确定位议程；其次要协调双边和多边的政策互动，增加相互信任和熟悉度。

关于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未来前景，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院长王缉思教授在其新书《大国关系》中提到，决定中美关系未来走向的关键因素，不在于两国的外交和相互认知，而在于中美各自的国内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方向。建立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不仅是国家领导人及外交部门的工作，它更是一种融合内政、外交、第三方力量等诸多因素的“立体工程”。任何国家的外交都必须服从国内政治需要，而不是相反。中美两国的发展道路和经验十分不同。美国是一个相对成熟的资本主义社会，但也正在经历一系列艰难的变革；而中国的改革开放已历经 30 多年，仍然处在“正未有穷期”的现在进行时。两国都处在一个不可逆转的全球化进程中，各自的发展道路是“分道扬镳”，差异越来越大，还是“殊途同归”，相向而行？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能否成功构建，更多地取决于对这一问题的回答。

美国学者对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内涵的理解尚未形成明确的界定和广泛的共识，大多从内容上加以诠释。正如布鲁金斯学会东北亚研究中心主任卜睿哲（Richard C. Bush）说，一套包罗万象的基本原则更符合中国的偏好，而通过在具体议题上的互动来汲取经验教训，更符合美国的愿望。美国前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大西洋理事会主任斯蒂芬·哈德利（Stephen J. Hadley）在第三届世界和平论坛上发言指出，首先，美国要接受中国的和平崛起，接受中国崛起成为一个全球的力量；第二，中国接受美国是亚太地区维持稳定的一支力量；第三，两国的成功有赖于共赢的合作，而不是零和博弈，美中各自的成功可以为对方带来大量的利益；第四，两国必须根据互利共赢、相互尊重的原则发展双边关系；第五，两国必须通力合作共同管控可能存在的